

中国历史 研究

第1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台港澳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

台港澳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

中国历史研究

第一辑

K202/52

版社

编 后 记

本辑收集的是台湾史学界近年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论著和文章。其中,《中国史学略论》和《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》的作者,均是台湾史学界有影响的人物。《西周年代新考》,具有一定学术价值。现代史部分中,有的文章,如《复兴社创建经过及其贡献》,政治倾向反动,但因披露了一定的史实,故也收录在本辑中。对于这些文章中的反动和错误观点,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中国历史研究(1)

——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文津街六号)

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16开本 9印张 230千字

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: 11201·29 定价: 2.30元

[内部发行]

DA52/27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，广大科学研究人员，文化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党、政有关领导机关，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。为此，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，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，系按专题选编，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，一般不作改动（如有改动，当予注明），仅于每期编有目次，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，以资查阅；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，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，蓄意捏造、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，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，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，甚至对立，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，对此，我们不急于置评，相信读者会予注意，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，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，不再一一注明，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，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，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，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，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，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，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

DA58/27

目次

论 著

中国史学略论

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

西周年代新考——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

治史答问三则

“无孔不入”、“有缝必弥”

史学二陈

通贯的断代史家——吕思勉

古代史

东汉至西晋初期（西元二五——二八〇）

中国境内游牧民族的活动

宋人对胥吏管理的看法

近代史

梁任公与民国

现代史

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（选载）

——并述“五四运动”及其辞职复职情况

复兴社创建经过及其贡献

八年抗战史略

——中日二十二次大会战经过简表

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

长沙大火与张治中（遗作）

人物传记

明末孤忠朱舜水的一生

连雅堂先生的生平

板桥林家花园的上代人物

国父孙中山先生与宗教的关系

七七抗战中的宋哲元

补 白

康有为与我的祖父

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的记录已发现

钱 穆 一

秦孝仪 三〇

周法高 三五

严耕望 六七

六七

七二

七五

金发根 七八

刘子健 九〇

王 泳 一〇四

蔡元培 一一〇

邓文仪 一一七

《艺文志》资料室 一二二

张发奎 一二六

潘公展 一三〇

郭 垣 一三三

《艺文志》资料室 一三八

唐 风 一四一

一一六

云 汉 一二九

七七

《中华杂志》编辑部译 八九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20018

1120018



中國史學略論

錢 穆

壹

一、

中國思想之偉大處，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觀。如言死生、存亡、成敗、得失、利害、禍福、是非、曲直，莫不兼舉正反兩端，合爲一體。其大者則如言天地、動靜、陰陽、終始，皆是。

今言前後。空間有前後，時間亦有前後。依空間言，眼前面前謂之前，一切行動必向前。儼須向後，則須轉身，仍向前。但時間則過去謂之前，未來謂之後。人之生，自幼到老，乃從未來向過去，始謂之向前。今謂人自幼童向青年，向中年，老年，則成爲從過去向未來，乃退後，非前進。成爲由生到死，過一日則少一日，漸近死，漸離生，豈不成爲人生之倒轉。人生貴有積有成。生日積，則幼童成爲青年，又由青年積成爲中年老年，此之謂壽謂福。人生須多壽多福，待其死則此生已畢，非爲由生進到死，乃爲其生已盡，變而爲死。但生是生，死是死，正反可合，不得相混。在我之前，早已有生。父母即我之前生。由父母生我，我乃父母之新生，父母乃我之舊生。亦可謂父母乃我之前生，我乃父母之後生。使無父母之前之舊，又何來有我之後之新。新舊有如前後，亦正反相合。

中國乃一宗法社會，身生命之上尙有家生命。我生以前，有父母祖宗。我生以後，有子孫傳世。而重舊尤過於重新。家則必稱舊家，人則必尊老人。人能老，家能舊，中國人則謂之福。

由人生之積而舊而有成，乃有史。一人有一人之史，一家有一家之史，一國乃有一國之史。以孔子爲例，孔子一人有其史，其家亦有史。自孔子迄今，已傳七十餘世。自孔子以前，尙可推溯以至於商祖契，當亦有數十世。則孔子一家已歷四千年以上。其實中國每一人每一家皆然，惟孔子可供作標準之一例。而中國亦已歷五千年而長存。

然則人生向前，乃向古老往舊之前，而日積月成。此後未來，胥當向此過去而前進。近人言歷史不可變，人生則胥向此

不可變之史而前進，即向此已成之局而前進。在其過程中，則不斷有新的發現。祖宗乃其一家之舊，子孫則其一家之新。一切新則胥向此舊而前進。故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儼無新，則其舊失去，不得仍爲舊。惟中國乃爲舉世其他民族中一舊，歷世已五千年以上，即讀一部中國史，例證顯然矣。

今人乃謂歷史乃由舊向新，實則新在後，舊在前，歷史與人生皆當向前，不當向後。若向後，則成倒退，烏得謂之前進。今惟當由未來前向過去，不當由過去倒向未來。因過去在前，已顯已知，已有定有成，乃有意義與價值。未來則尚隱不知，無定無成，乃無意義價值可言。今一世則羣求鄙棄此已見已知有定有成之有意義與價值者，轉身倒向於尚隱不知無定無成無意義與價值之一途而邁進，遂使此世界落實到今日不知明日之悲局，是誠大可浩歎矣。

人之求知，亦惟知其過去之舊，不能知其未來之新。中國史學言鑒古知今，凡其所知於今後者，亦本於其知於前古者，而推以爲知。故孔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苟於其前古一切不信不好，則自我創造亦惟無把握冒昧危險之一途而止。他又何言。

故求深切體會中國民族精神與其文化傳統，非治中國史學無以悟入。若如宗教哲學文學科學其他諸端，皆無堪相伯仲，相比擬。

今再以當前淺近處具體言之。今日人生已成爲一機械之人生，如電燈自來水種種日常生活，皆賴機械。電腦尤然。非賴機械，人生將無以度日。現在世如此，未來世益當然。百年前馬克斯已唱爲唯物史觀，此下唯物當轉爲唯機械。如太空飛行，近人乃謂當以征服太空。其實所能征服者，僅地球附近四圍之太空。實亦未能真征服。外此尚有太陽系之太空，尚有不知幾千萬倍以上之整個自然體之太空，豈當前機械所能征服。當前機械之真所征服者，實乃當前之人生，亦即當前之人心。而人心終有所不甘。人心儼肯甘受機械征服，則核武器之發展當使人類不再有戰爭。今則一反其道，戰爭危機更逼前來。今人乃謂乃未來世向現在世挑戰，實則仍是現在世在領導未來世。而舉世人心於此終不悟，此因人心已受機械之奴役，人心亦已機械化，而不能再自主。則世界末日，乃機械征服人類。人類消滅，機械庶亦告終。莊周言：「薪盡於爲火，薪盡而火傳。」但薪之爲火，亦一自然。而人心之創爲機械，則實非如自然之薪。故中國道家乃並求廢枯槁謂其啓機心。機心起，則機械

自隨而至矣。

馬克斯分當前人類爲有產無產兩階級。實則人生不能無產。惟當前人類則憑機械爲產，無產階級亦分得此機械。如當前蘇維埃之擁有更多核子武器，則所謂共產，豈不爲人類更大之災禍。此則馬克斯所不知。就當前論，不僅核武器當廢，電腦之類亦當廢，電燈自來水之類可不廢，但當改良其用途，不當求無限之發展。當追隨於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，不當違反於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。人類生產當求以農工爲本，不當以工商爲本。此則觀於中國西方之歷史發展而可知。

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人類從自然，重自然，乃以舊人類求爲新人類。求能立，即立在此自然，即立在此過去與現在中，而始能領導其未來。勿使未來之新來干擾此過去現在之舊。先能立，始能不惑。立此舊，始能不惑於其他一切未來之新。則人類之新亦以完成此大自然之舊。此之謂「一天人，合內外」。則有因有革，雖百世而可知矣。

孔子又曰：「富貴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富貴須求之於外與未來，所好則在己之一心之當前與過去。求之外與未來，中國人謂之欲。吾之所好，在己心，在當前，在過去，不求自得，中國人謂之性。機械皆從欲來，不從好來。人生能從過去世現在世以直達未來世者，此惟性，性則己之所好。因其性而有革，乃革其不可好者，非別有所求也。有所求而自違其性，自毀其舊以求變，變而日新，乃終不見所好，此則人生之悲劇矣。此惟善讀人類已往歷史者，始能知之。西方人不重歷史，此則其大失。電腦核武器一切機械皆憑以有求，非即所好。中國人言立言達，立於所好，始能達其所好，亦惟從其所好而已。孔子曰：「我欲仁斯仁至」，求仁而得仁是也。電腦核武器一切機械皆非人性所好，非可於此立。非所立，又何達。核子戰爭又豈人之所欲達。故現世所將達，乃無人能預言。

二、

中國人言，「人惟求舊，物惟求新」，人與物，大體乃有生無生人文與自然之分別所在。生命時間延續，新生命皆從舊生命中開發成長。物無生命，僅占空間，舊物已成，新物則待另製再造。故生命富共通性，而無生物則富分別性。中國人重農，日與生命接觸，故中國人觀念亦富共通性，生發性。西方人重商，貨品多屬無生物，故其觀念乃多傾向分別性與創造性。

抑且物供人用，如電燈助人視，電話助人聽，電腦助人記憶，機器人助人操作，其用各不相通，故貴專。生命則一體之內各部相通，又貴與體外相通。中國人言，人爲萬物之靈，靈卽其通之尤者。故其於行爲知識思想皆貴通。

語言通達人心，但各地方言可各不同，又難長時間綿延不變。西方有希臘語拉丁語，以及現代諸國語，既無共通性，亦無傳統性，亦如一物，日創日異，分別日增。其文字卽代表其語言，西方文化正可據此推論。中國人則於語言之上更創文字，求其更相通，而更可久。而中國文字乃亦如有生命性。一部康熙字典所收字不到五萬，而日常通用字亦不到四千，或可更減至一千字，而適用全國已達三四千年之久。新增事物，皆可用舊字配合應用，不煩再造新字。如電燈電話電腦機器人等，一切新器物豈不只用幾個舊字卽够。現世然，後世亦將仍然。中國之得爲一廣土衆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，文字之用亦有其大貢獻。中庸所謂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」西方直到現代，僅於物上達到車同軌之一階段。書同文，行同倫，皆非其所

有。

中國文字應用，尤貴其在人之觀念相通上。如身家國天下四觀念，中國沿襲承用已達三千年之久。中國古人已知於國之上當有更高一層之搏合，卽爲天下。當時中國人知識尙不知一亞洲，更何論於五大洲。但此天下一觀念，至今仍可承用。西方人則於國之上並無一天下觀，至今仍僅有一國際觀。國與國之間有問題，何從得解決，當前舉世大亂卽由此。

國與國之間，有共通事，有相互事，非列國分別所能解決。如唐虞時代之洪水爲災，此乃列國共通事，乃共同朝向中央政府，積堯舜禹三帝之力而得解決。又如虞芮相互有爭，乃朝向於西伯昌卽後世所稱之周文王以求解決，所謂「虞芮質厥成」是也。中國古代於列國諸侯之上有天子，其實天子亦如一諸侯，僅治其王畿之內之本國事。惟爲其他諸侯所朝向，乃兼管天下事。惟此一共同所朝向者，亦必歷時而變，故言朝代。唐虞夏商周，或禪讓，或征誅，有朝卽有代。秦以下，中國全國僅一中央政府，但如漢唐皆稱代，故中國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。惟尙有天下在其上，范仲淹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」顧亭林言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」是也。此等觀念，又豈今西方人所有。

以現代國際形勢論，如舉世一百五六十國，果使共同朝向於美國，蘇維埃亦仍是一國，仍可處理其國內事。惟遇國際共通事，或相互有爭，則由美國爲之平定。倘美國不勝任，舉世改朝向蘇俄，此則另是一代。但美國則仍是一國，仍得處理其

國內事。中國古代之封建政治乃如此。苟能爲現世慕效，豈不舉世可得和平。中國古人則稱之爲大同太平世。列國分治，則僅得有小康，不得有大同。故中國於治國之上又有平天下一大道。中國之行同倫，必達之於天下，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是矣。

春秋末，孔子墨子以下，中國士人盡不守國別觀，而均趨於天下觀。百家羣興，歷兩三百年而乃有秦代之統一。現代各國知識界，各抱國別觀，均無天下觀。苟使無如中國歷史上戰國一段之演變，則何能由中國唐虞三代之封建政治，走向中國秦漢以下之大一統制，乃可舉世有一最高中央來領導，此即中國人所謂平天下之大道，非今人之所能期望矣。

主要病徵，在舉世西化，重物而輕人，喜新而厭舊，不知以現在世來宰制未來世，而都求以未來世來改變現在世，本末顛倒，虛實混淆，人盡待之未來之虛，又於何處用力。抑且中國政治必尚禮，禮則本於人之性情，亦富生命性。西方政治必重法，法則必仗權力行使，本於外，非可歸之內，無生命性。故禮亦心，法亦物。故中國文化可謂之乃一種人本位之人文文化，亦可稱人倫化，乃一種富於生命性之文化。西方則爲一種重物輕人之器物化，唯物化，進而爲機械化，無生命性。此則其大異處。詳研雙方史學而可知。

中國史學有所謂鑒古知今，亦即一般學問之所謂溫故而知新。朱子詩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養轉深沉。」新知即從舊學來，此舊學新知之一貫相承，即自然科學亦不能例外。亦可謂學惟求舊，知惟求新。豈有廢棄舊學，乃能開創新知之理。故學必貴有舊傳統，而知乃始有新啓發，新舊自有其一貫融通處。惟自然科學重在物，史學人文學重在心。物則重在能分別，心則重在能會通。非通古人之心，焉能知古代之史。故稱萬物，亦稱一心。物稱萬，故曰物惟求新。心貴一，故曰人惟求舊。萬物各別，其會通處則在數學上。人事亦多變，其會通處則在人心之德性上。中國史學重人品觀，即人之德性觀，此乃其最精邃處。德性則只分高下，並不能分新舊，此一層當明辨。

貳

一、

歷史記載人事，人不同，斯事不同。人爲主，事爲副。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。事之不完善，胥由人之不完善來

，惟事之不完善，須歷久始見。中國史學重人不重事，可貴乃在此。

事有外形同，而內情必不同。一人不能獨成爲一事，必集衆多人之情志以成，而其事乃更複雜。亦有單獨由一人興起主持其事，其他人乃無情無志而追隨，則其事之意義價值亦只在二人。要之，事之重要性，常在少數人，不在多數人。中國歷史重人，尤重少數人。此乃中國史學一特色。

管仲相齊桓公，霸諸侯。桓公爲君，管仲爲之臣。然孔子則僅稱管仲曰：「微管仲，我其披髮左衽矣。」此爲中國史學精神，最值深研。如孔子開門授徒，弟子賢者三十許人，論語載其事。孔子之教各不同，諸弟子之學亦各不同，細讀論語而可知。孔子爲中國一大教育家，亦中國歷史上一最大人物，而論語亦不啻爲中國一最有價值之史書。孔子之教，與西方古希臘蘇格拉底不同，知此，斯知中西人事不同，而主要則在人不同。今人稱孔子與蘇格拉底同爲一哲學家，斯失之矣。

中國正式第一大史學家，當首推漢代之司馬遷。其爲史記，乃自稱上學孔子之春秋。其中有深義，當加闡申。最重要者，乃爲其重人更重於事。其書自五帝三代起，春秋戰國，其往事僅撮其大要，不詳記載。如管晏列傳，有關齊國大事均略，而獨敘管晏二人遺聞軼事三數節，非以詳其事，乃以見其人。凡其人之事業，則胥從此等小節瑣事上樹立基礎。此正中國文化傳統大道精義之所在。孔子曰：「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。」諸葛武侯言：「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終寄臣以重任。」中國人認爲，細行能慎，能負天下之大任。馬遷此一篇管晏列傳，近似文學小品，實涵哲學大義。爲中國一史學家，又豈止於記載往事而已。

又如戰國時，遷書記孟嘗、信陵、平原、春申四公子故事，均不見於戰國策。而如孟嘗君門下之馮煖，信陵君門下之侯嬴，平原君門下之毛遂，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遘難得之傑出人才，然世人亦僅知有孟嘗、信陵、平原而已。自經遷書之詳載，乃知孟嘗信陵平原之得爲孟嘗、信陵、平原，其背後乃大有人在。此乃一番絕大提示，絕大指點。使處親貴之位，而欲有所作爲，當先知其所用心。而豈廣攬賓客，鑒其飲食羣居之所欲，而即能有所成就。

遷書所詳，乃在漢初開國以後。其先劉項相爭數年，軍事勝敗，寥寥幾行字即盡。然於項王沛公之爲人，性情隱微，則鉤劃如見其肺腑。而於兩人之部下，則敘述尤備。項王部下，僅范增一人而不能用。沛公部下，則有如張良、蕭何、韓信，

又其次如陳平、曹參、樊噲，更其次以至黥布、彭越、陸賈、叔孫通等，開國功臣，遷書詳者，不下二十人。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爲功業，可謂備矣。當知漢祖開國，非漢祖一人之事，乃其一集團二三十人之事。至於開國之大業已成，分封功臣，不再詳載。西方晚近始有史書，僅只記事。中國史起源甚早，又必詳其事之成敗所由。其所由則盡在人。一事之成乃有不盡於一人者。並有無其事，而許其人，則猶見中國史學之深義。

卽如秦始皇帝，其削平六國，統一天下，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，抑且亦不始於秦始皇帝之時，而尙遠在其前。細讀馬遷書亦可知。今人則誤謂秦祚始於秦皇一人，漢祚始於漢祖一人，則秦皇漢祖，宜可專制全國而有餘。此亦不細讀史書之誤。漢祖之得天下，一曰不嗜殺人，又一曰善用人才。而遷書之傳項王，則有三大事，一曰邯鄲之戰，一曰鴻門之宴，又一曰垓下之圍，以及烏江之自刎。項王爲人可愛處，實多於沛公。此又見中國史取人之宏，與其教人之深。而遷書此等處，遂成爲千古妙文。中國文學善於寫人，故一部良史，同時必是一部好文學。不通人生，則無以讀中國之文史。能通文史，始乃得爲中國之通人。秦漢以下中國之學，卽謂之乃文史之學，亦無不可。而司馬遷之大功不可沒矣。

又秦末羣雄競起，論其事，則陳勝吳廣最先發難。然遷書未加重視，亦非以成敗論人。田橫身敗，流亡海上。應漢祖召，驛站自刎，在漢初開國史上可謂無影響。其隨亡者五百人，則更無姓名可考。秦末漢初之際，死者千千萬萬，遷書乃獨詳田橫及其賓客五百人，成爲千古文學嘉話。此下一部中國二十五史，類此者不絕。若果以今人之史學眼光加之衡量，則此等無關歷史大局之記載，豈不認爲煩文瑣節，濫充篇幅乎。

繼馬遷，有班固作漢書。斷代爲史，又中國史學一大進步。自古無不亡之王朝。後一代起，爲前一代作史，蓋棺論定，語無忌諱。而歷代新王，亦許其如此。是亦心知其子孫之不得永有其國矣，此亦中國史學一特有精神所在。班書有李廣蘇建傳，實爲李陵蘇武合傳，上承馬遷魏其武安等諸合傳來。同一時同一事，而參加之人不同，人與人之相比，是非高下，最易從此等處顯。李陵以八千步卒當匈奴五萬騎，可謂不世出之將才矣。蘇武北海牧羊，事若平易。孔門以回賜相比，又以賜商相比。彼人也，我亦人也，彼能是，我何爲不能是。以事論，則海上牧羊與兩軍抗衡難易不能相比。以人論，則李陵之與蘇武，一相比而確見其爲兩人。中國史學偉大，亦正在此等處。

自唐杜佑作通典，於斷代史之外，又有通史。此又爲中國史學一大進步。通典爲書，即從馬班之書志來，取材相同，用意大別。朝代易，而制度相承，此亦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也。孔子言：「如有用我者，我其爲東周乎」。又言三代因革，而曰：「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。」孔子此意，爲後代史學家所承襲。故治儒家言，必讀論語，又必讀馬班杜氏書。否則無以爲通儒，亦無以治史學。

南宋鄭樵繼杜佑作通志，擴大爲二十略。又爲中國史學一大進步。馬班之書重人，杜氏之書則重事，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謂事。至鄭樵，則不啻欲爲一部文化史，盡包一切人文而通之。然傳統重人不重事之見解，固猶保守無矢，亦可謂大而化之矣。清初顧炎武有日知錄，其書包容廣大，亦即史學。非寫史，乃論史，而亦寓有鄭樵意。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。日知錄一書，亦足爲天下興亡負責。亦可謂馬班鄭之書，亦莫不爲天下興亡負責。能知此意，乃能知中國之史學。

施耐庵水滸傳，亦可謂師法馬遷。忠義堂一百零八位好漢，尤其是三十六天罡，性情各別，才智互異，而宋江獨不見有奇才異能之表現。其高踞忠義堂之首席，乃爲沛公型，非項王型。一百八人外，先之以王進一人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亦遷書七十列傳以伯夷爲首之遺意。但就中國人傳統心情言，讀其書，雖亦情節動人，終嫌其事出虛構，不真實。中國人喜腳踏實地，在實情實節上下工夫，此即中庸之所謂誠，孟子之所謂有諸己之謂信。空議論，假故事，中國人向不重視。金聖歎力讚此書，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之著作同稱爲才子書，然莊屈馬杜終不得僅目其人爲才子。水滸傳亦終不列入爲中國文學之正統。西廂記則僅兒女私情，不能與水滸忠義堂相比，更不待論。而聖歎之言，亦終不爲此下學人所共認。此乃有關民族性情大綱，自誠明，自明誠，主要先在一誠字。而誠又須合內外。耐庵此書，縱謂其亦誠於心，但不能誠於事，所以亦終成爲小說家言。

抑且耐庵此書，縱謂其能教亂世，但終亦不能教治世。傳之江湖山林，不能傳之廊廟官署。感於草莽，不能同感之於衣冠。其書成於元明之際，而明祚一統，其書終見不適。於是羅貫中即繼之有三國演義之問世。全本三國實事，然爲通俗，求取大眾愛好，則情節不得不有委曲。如曹操，兼擅政治、軍事、文學，爲一時代傑出人物。而廣攬人才，尤爲難能。其善待關羽，更可見。荀彧至晚年始離異。操之立意欲爲周文王，必待其子始受漢禪。但終諡爲武帝，其子丕乃諡文帝。即此小節，

可見中國亂世亦與其他民族之亂世有不同。故廣土衆民，得繇延五千年不絕。試讀曹操之述志令，此亦見吾民族之傳統性情，惟誠僞有辨而已。杜甫詩「將軍魏武之子孫」，則操之爲人，唐代猶見尊。司馬光資治通鑑，亦仍以正統歸之魏。朱子通鑑綱目，始有魏蜀正統之爭。然朱子書法，自謂乃慕效曹操，則操之爲人，即就理學大儒言，亦尙不深嫉。三國演義出，曹操乃成一不足掛齒之亂世奸雄，一無是處，則又何以處曹操手下之羣才。諸葛亮一生謹慎，而演義中之諸葛，則綸巾羽扇，儼是神仙人物。其於魯肅周瑜，又盡失其真。當時三國之所以得成爲三國者，演義書中皆失之。而關羽則以演義一書出，社會羣尊爲武聖，其地位尙在岳武穆之上。然論三國眞史迹，關羽不能遵諸葛東和吳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針，三國形勢起了大變動，此皆演義一書無當史實之大者。其實演義一書，亦承朱子爭魏蜀正統一意見來，與水滸傳同爲教忠教義之書，無失儒家大傳統。然中國人爲學，最貴在通。演義違背史實，亦終爲小說家言，宜亦不得列入文學之正統。

史學明與文學有別。然如司馬遷、班固、陳壽、范曄之書，中國治文學者必所誦習。曾國藩繼姚鼐古文辭類纂後，編爲經史百家雜鈔，則中國經史百家，盡皆文學也。其爲聖哲畫像記，雖寥寥一短篇，然所列聖哲，則已盡包容了經史百家之學。而更要者，爲學必志於聖哲。曾國藩乃一文學家，其人則亦如曹操之政治軍事文學皆所兼擅。與諸葛亮王守仁亦相類似。而曹操爲人與此三人比，則判若天壤，絕不可以相提而並論。則中國史學之重人不重事，即此亦見其大義之所在。

子貢曰：「君子恥居下流。桀紂之惡，不如是之甚也。而衆惡皆歸之。」此非爲桀紂申冤，乃重其上下流之辨。流，猶今人之言趨嚮。曹操爲人，亦終易教人趨於下流，是以亦衆惡皆歸之。故中國人之爲人爲學，主要在辨其高下，辨其誠僞，辨其流，亦必明其統。如讀水滸傳三國演義，讀者之心亦每易趨於下流，不易登入上流，故亦終不得爲文學之正統。

今人則據西方人意見，史學重事，文學則重在其能通俗大衆化，故小說戲劇乃成文學正統。而不知其弊。欲專意爲一文學家，則可盡擯經史百家於不顧，鄙聖哲而不爲。人之爲學，雖固爲己，亦當爲人，爲後世，而豈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。而又爭惟此乃始爲正統。不以事論，而以心論，心即其爲人之主。中國人之爲人爲學，自亦有未可厚非之處矣。國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。

然而中國史學，此下終當有所變。惟求變而當不失其大統。人才衆起，列傳一體勢難網羅，此一也。事態複雜，端緒繁

，曲折多，馬班之書與志，杜佑之通典，鄭樵之二十略，皆難詳盡，此二也。已無朝代之更迭，寫史何始何終，此三矣。是則中國舊史體例已不能守，如何成新史，此須有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者，創爲新例，有如司馬遷其人者出。或有三數人出，分工合作，以共創此新體，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爲。此皆非當前之所能預知。然當會通羣學以創成爲新史學，仍當重人，又當重其人之性情。則舊史學之大統所在，宜當善守之而弗失。此則仍當揭舉以爲新史學之綱領與宗主，可無疑義。姑懸余言，企以望之。

二、

余曾謂歷史記載人事，而事必出於人，故中國史重人尤重於其事。一美國史學家當面質詢，果使其人不爲歷史人物，則其事又豈得見於史。余答，此乃中西雙方歷史一大不同處。中國史籍中，更多非歷史人物，有超出於歷史人物之上者。此非細讀中國史，無以知之。

余姑舉一例，如近代平劇中有韓玉娘其人，乃載入明史及新元史，然實爲一不知姓名之女性。近人造爲平劇，乃姑以稱之爲韓玉娘而已。此人之不得爲歷史人物即可見。中國史學此一端，當值深論。

卽如中國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，其人性名，乃從無知者。西方史學稱石器時代鐵器時代，誰始用石用鐵，則可不論。惟知其時代之爲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則已。中國人則不稱巢居時代火食時代，而必特舉一人以爲此時代之創始，此卽中國史學重人尤更重於事之一證。

中國人論人，則必分好壞善惡，卽君子小人賢奸之辨。善人君子賢人固得見於史，而小人奸惡亦得入史。如夏商兩代，禹湯固必詳，而桀紂亦必及。其他帝王，或僅存其名，或並其名而不載。近代人重多數，其實一部美國史，開國以來兩百年，總統五十人皆有其名，其他姓字不詳者何啻億萬倍。是西方史學亦重少數，惟賢奸之辨，西方人似不以爲意。

人分賢奸，斯事有褒貶。褒貶乃成中國史學之要綱。未有不分賢奸，不加褒貶之史學。史之褒貶，亦不始於孔子之作春秋。齊崔杼弑其君，齊史臣執筆直書，而見誅。其弟承襲史官位，又續書，又見誅。第三弟再續書，乃免。有史臣在野者，聞其事而來，則史筆已定矣。當時列國史官，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，其職世襲。周之東遷，天子聲威掃地已盡，而史官守職

；執筆直書，置身家死生於度外，有如齊史之所爲者。其實齊君亦非崔杼親殺，而終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。此乃中國傳統史學精神，亦可名之曰中國傳統民族精神。然當時史臣之具此精神者，已不多見，故孔子作春秋而曰：「此天子之事也。」孔子非任史職，乃因魯舊史作爲春秋，褒則褒，貶則貶，游夏不能贊一辭。此可謂由孔子之春秋而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矣。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，而豈孔子之自我創造乎。

今試捨春秋而讀左傳，此乃集合當時兩百四十年列國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記載，而彙以成書。而其人物之賢奸，人事之褒貶，亦已至詳具備矣。孔子亦信而好之，承而述之而已。繼左傳又有國語，有戰國策，此等書皆不知出於誰何人之手，惟知其決不出於一人之手而已。然而所載人物無職無位，而賢奸褒貶，則既詳且備。其事則亦多無關於君國之大。此皆中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之隨時隨人而流露，爲並世其他民族所無有。近代國人讀之，則曰此乃封建社會事。如讀崔杼弑其君，則謂此乃專制政治下尊君觀念之表現。則試問何以在封建社會之上猶得有專制政治？近人必以西方史學來治中國史，則恐終難理解矣。

西漢司馬遷作爲史記，乃取法於孔子之春秋，其記事多采之左傳國語國策諸書，而有取捨，又有增益，茲不論。姑論其載楚漢之際，乃及西漢開國後事，則所略而不備者多矣，而乃特載田橫其人與其事。此亦特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處。至於漢之立國，是非爲一帝國。漢之爲政，是否爲帝王專制。此皆可據遷書而論定。今人則必依據西方史學觀念與成語來加之中國史，則遷書亦可束高閣矣。

余於中國史學重人物，即多論列，然猶有不盡於是者，試再加申論。

中國人死，骨肉埋於土，立一木爲神主，期死者魂氣之常駐。祭之拜之，孔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木偶陪葬，孔子則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。」惡其薄生人以爲死人也。古埃及爲木乃伊，藏金字塔中，重得復生與否可不論，其屍其塔則歷千古而常在。希臘人雕石爲女形，藏之大建築中。建築雕刻長存，斯止矣。人生之安與其美則似轉不深求。中國之詩則曰：「窈窕淑女。」窈窕即安居，斯美矣。不在其體貌與宅第。此即中國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證。

戰國策蘇代告孟嘗君，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。史記說苑皆載之。堆土爲人，無傷土質，雨淋仍爲土，亦仍得堆爲人。雕

木梗爲人，已傷木質，或遭打擊焚燒流蕩，此木梗將失所歸，亦將失其爲木梗。以歷史言，中國史如一土偶人，西洋史則如一木偶人。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，朝代興亡，中國則仍爲一中國，中國人亦仍爲一中國人。故中國歷史乃有其共同性。西洋史則惟見分別性，希臘各城邦，即各自分別。雅典人、斯巴達人即互不同。羅馬繼起，更有別於希臘人。現代國家興起，又更有異於羅馬人。尤如英法德意，大小各國，亦各相異。中國史同爲一塊泥土，西洋史則各別各成一條木梗。

中國人重在人羣中做人，再由人來做事。西洋人則在做事上來做人，在人羣中乃看重個人主義。孔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孝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又曰：「若聖與仁則我豈敢。我學不厭，而教不倦。」學則學於人，教亦教於人。而所學所教，則即此人羣中相互共同所應有之忠信之德。老子亦曰：「既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」在人羣中做人，爲人與人，而仍能已愈有已愈多，亦即見羣己之一體。西洋人重事，而他人則爲之工具，爲之奴役，或爲之犧牲。工商業之發展，寧非如此。

即如宗教，教徒與教外人別，新舊教牧師與神父亦有別。政治嚴權位之別。社會嚴貧富之別。故西方有宗教戰爭，有民主革命，有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裂鬥爭。即如學術，科學哲學文學美學，事業分，人亦別。牛頓與康德遠相異，莎士比亞與貝多芬大不同，人爲事縛，乃不見有人類德性之大同。

至晚近世，學術益分益細，而史學與政治學兩項乃終不占西方學術中之重要地位。政治家多從人事出，絕少從其專治政治學來。而史學則僅記往事，又若與當前實際人事無關。在中國學術界，則政學史學正爲一切學問中心主要兩項目。孔子卽爲其代表。中國人言學以成家，乃指其上有師承，下有傳人，如一家之相承。仍指其共通性，與西方之個人各業相別各成一專家大不同。故中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，乃可由一人兼而通之。如北宋歐陽修卽其例。經史則其學，子集則以教，而治平大道則爲其總目標。故中國學與西方異，人則亦異，而史亦異。欲治中國史，不通其人其學，則一堆往事尙何意義價值之有。

人從天來，今從古來，故司馬遷作爲史記乃曰：「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。」西方宗教科學哲學亦若爲求通天人，西方社會學法律學經濟學軍事學則亦若求通古今之變，但豈能囊括而無遺。故中國之史學乃爲集大成之學，而人爲之本。聖賢豪傑，亦卽集爲人之大成。

中國人重爲人。惟有人，始有事。不成人，何成事。故中國人於事，每主退不主進。如孔子，甚爲魯哀公季孫氏所重視，苟能相與，和衷共濟，於魯國當時之政，必當有所成。但孔子之爲人則必將由此而有損，則其所成亦不能大。孔子退而去魯，遂完成孔子之爲人，而其影響及於後世，則有勝於堯舜文王周公之上者。亦可謂非知孔子，則無以知中國史。非知中國史，亦無以知孔子。其他歷史人物皆然，惟有其正反損益廣狹久暫之不同而已。讀西洋史，則當從其一事一事論，不得從一人一人論。希臘羅馬迭興迭亡，此爲事。周公起，孔子繼生繼起，此爲人。人存政舉，人亡政熄。亦可謂，其人存其史舉，其人亡其史熄。惟治中國史，乃能明其義。近代國人羣慕西方事，盡鄙中國人。不幸而世界第三次大戰續發，核子武器逞威，一部中國史，庶可獲我國人之重加反省，此誠無可奈何之事矣。

叁

一、

易繫辭言：「夫易，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是而已者也。」朱子註大學：「物，猶事也。」中國人每事物連言，物上必有事，事中必有物。如人生衣食住行，食則五穀百蔬，鷄魚豬羊。如衣，蠶桑絲織，麻布棉裘。住則洞窟巢穴。行則車馬枵筏。豈不皆因物見事。卽至近代，電燈電話電腦，凡屬科學發明皆然。此卽易之所謂開物成務也。近代國人羣尊易爲一部哲學書，但易書中亦多言及科學。中國學術傳統，本無哲學科學之分。卽易之一書而可見。

易繫辭又言：「是興神物，以前民用。」神物連言，天地亦神亦物，亦以供民用。是西方宗教，以易書言，亦與哲學科學渾成一體。繫辭又言：「見乃謂之象。形乃謂之器。制而用之謂之法。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，謂之神。」神屬宗教信仰，然如易言，則電燈電話電腦皆可謂之神，則科學豈不與宗教相通。繫辭又言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道器並言，亦屬一體。形上形下爲兩端，而形爲之中心，所謂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捨其形，又何以見形而上之道。故言事則必言物，言器則必言道。猶之言天則必言地，言德則必言業。形上形下，則必通而言之，以見其爲一體，則哲學科學豈不亦相通。近代國人乃以形而上三字譯西方之哲學。但如牛頓之萬有引力，此乃西方科學上一大發明，亦卽形而上者。萬有乃其